

琼崖革命根据地

财经税收史料选编

海南行政区 财经税收史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档 案 馆

海南人民出版社

琼崖革命根据地

财经税收史料选编

(革命回忆录部份)

(二)

海南行政区财经税收史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海南行政区档案馆

海南人民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封面设计：蒙国丰

责任编辑：邢益森

目 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琼崖财经工作片断回忆·····	郭儒灏 (1)
陵水县人民抗粮斗争和苏维埃政府财税工作的回忆·····	陈蕃尧 (2)
琼崖革命斗争初期的情况回忆 (节录) ·····	罗文淹 (4)
琼崖的“小莫斯科” ——土地革命时期活跃的乐四区后勤工作回忆·····	王先明 王兆明等 (7)
我在万泉河上收木筏 (排) 税的回忆·····	王植三 (9)
回忆母瑞山根据地艰苦奋斗生活和“琼苏经委”工作的情况·····	李 汉 (1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乐六区的小农场·····	王兆文 (14)
琼崖土地革命的中心——乐四区·····	王植三 (14)
万宁县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的实况·····	魏宗舟 (17)
在东六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回忆·····	陈帮兴 (18)
土地革命时期“琼文经委”及其“作经”活动·····	冯安全 (19)
回忆琼崖土地革命中、后期财经工作的概况·····	王月波 (20)
乐四区办的消费合作社和墟场集市·····	王先明 王玉尧 (22)
东四区的土地革命和财经工作片断回忆·····	罗志民 (2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东县财经工作回忆·····	陈帮兴 (25)
在印刷局的日子·····	吴任江 (26)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前期琼崖财税工作回忆·····	林诗耀 (27)
回忆东北区民主政府的财税工作·····	占力之 (29)

琼崖抗战初期财经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月波 (32)
英明的决策 光辉的旗帜	
——回忆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前后的斗争事迹·····	李光邦 (33)
发行“文献伟”公债的回忆·····	符思之 (40)
琼崖特委贸易工作十个月的回忆·····	冯所鸿 (41)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宝芳乡的农村集市贸易·····	范泽川 (43)
回忆抗战时期和民乡亲们捐献的情况·····	符凤耀 (44)
昌感县昌二区海沙乡征收工作回忆·····	吴 华 (45)
开展对敌斗争,组织食盐生产,抓好盐税收入·····	邢保文 (46)
忆琼纵军械厂的建立与发展·····	陈大新 (47)
演丰海边交通站的回忆·····	林诗堂 (49)
创办大众合作社的回忆·····	吴坤宽 (51)
回忆《抗日新闻》社造纸厂建立的前后·····	吴多武 (53)
琼山县财经税收工作片断回忆·····	李高泰 (54)
琼山县羊山地区财经税收工作回忆·····	蒋益忠 (56)
琼山县税收征管工作概况·····	史昌勇 (58)
琼侨回乡服务团的片断回忆·····	符思之 (62)
回忆新加坡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方 克 (66)
抗日战争时期旺商乡的盐墟场·····	蔡琼祥 (67)
抗战时期澄迈县的敌后收税·····	李大勋 (70)
抗战时期九龙滩上的收税卡(站)·····	郑忠和 (72)
港北征税站的回忆·····	周光道 (74)
回忆抱罗乡的财经税收工作·····	王壮行 (77)
梅山乡人民开荒种棉花加工被服的情况·····	孙惠公 (79)
南区沿海税收、缉没活动片断回忆·····	张荣发 (79)
南宝乡人民筹集粮食支援抗战的回忆·····	王俊民 (80)
开辟地下航线,做好经济工作·····	陈有森 (85)
投奔革命,抗日救国·····	陈香钊 (86)
南区沿海财经工作及对敌斗争的回忆·····	周民锋 (88)

昌感县（昌江、感恩县）盐税征收情况的片断回忆·····	周民锋（96）
琼山县民主革命时期打没活动片断·····	郭儒甫等（97）
琼山县盐的生产及盐税征管工作的回忆·····	史昌勇（100）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回忆琼崖西海税务委员会·····	吴 英（103）
财经战线上的尖兵	
——革命战争时期的儋县经济认识·····	羊德光 林炳耀 许麟佐 黎民忠（107）
解放战争时期儋县的胶鞋厂·····	羊德光 张才光（112）
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纺织组·····	少 菁（114）
遵守人民政策法令，依照政策规定纳税·····	韩浓光（115）
积极支持革命的商人陈庄记·····	许益旧 万小梅 叶亚来口述（116）
在当南东乡征收员的日子·····	黄会生（117）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记解放战争时期海口市黄青党支部开展后勤工作的二、三事·····	黄 春（119）
石壁乡石虎岭收税站的回忆·····	黄心琼（120）
万宁县新区北大乡财经工作的回忆·····	周训堂（122）
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总部供销工作的回忆·····	冯耀裕（126）
丰碑永志英雄迹	
——缅怀为革命收财粮壮烈牺牲的七位烈士·····	（128）
税收英雄符福南·····	罗志民（132）
文北县财经工作的回忆·····	李光邦（134）
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	
——文昌县侨乡人民支前的事迹·····	李光邦（137）
定西特别区的财粮工作·····	周训堂（140）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崖县桥北乡的财税工作·····	孙其雄（143）

一九二七年琼崖财经工作片断回忆

郭儒灏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琼崖地委撤到乐会县农村。五月，省委派杨善集回琼工作。六月初，琼崖地委在乐会县四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发动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琼崖地委改为琼崖特别委员会，同时成立琼崖经济筹备委员会，由王×卿（王文明的同学）负责，工作人员有五、六个人。琼东、乐会、万宁、琼山、陵水等县也相继成立县经济筹备委员会，约有二、三人搞经济工作。当时，我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革命同志从家里拿钱出来支持革命工作。

二、向社会上的富裕户与进步人士募捐。同时选派一些同志到南洋一带开展募捐工作。如一九二七年组织派琼东县雷永铨、符功桓前往新加坡、马来亚捐回一笔钱（数字忘记）和一批药品，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

三、打没土豪劣绅、反动派与奸商的财产。一九二七年三月我讨逆军攻打乐会县城中原市，没收几个反动奸商的布匹和日用品；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讨逆军七、八十人又攻打北鳌港，打进国民党税收机关与海关，没收光洋三、四千元。打没收入最多的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攻打陵水县城，没收反动奸商大量财物，约值光洋一、二万元。

四、税收。这一时期的税收收入不多，仅征收猪、牛与椰子、槟榔等出口税（主要是出口香港），我们的征收办法是在公路上流动设卡征收，有时也派征收人员到各商家联系征收。税率是以国民党的为依据，但比国民党税额较轻为原则，以表示对商人的照顾，可以说是我们后来税收条例的雏形。在对某些产品进行征税前，我们都进行口头宣传，向纳税户进行教育，并公开张贴布告，贯彻执行“税收条例”规定。我曾经起草过这样的布告。

五、向农民征收粮食（就是现在的农业税——公粮），这一工作只在我们领导的有武装活动的地区进行，按土地面积和产量多少来决定征收大米（征收数量记不清了），没有米者，则收代金。

在财政管理上，是由琼崖特委经济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各地收入除留一定的费用开支外，逐级上缴，即乡上缴给区，区上缴给县，县最后上缴给特委。

当时的财经纪律很严格，对贪污舞弊行为，坚决进行处理。如有一个征收员（忘记姓名），在攻打陵水县城时，乘没收奸商财物的机会，偷拿了一些布匹回家，为了严明纪律，经请示上级批准，立即执行枪毙。

陈玉新、黎岛心整理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

注：郭儒灏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当选为琼崖特委委员。

陵水县人民抗粮斗争和苏维埃政府 财税工作的回忆

陈蕃尧

我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参加陵水县农民训练所受训，担任级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当县财粮委员会主任。一九二九年五月任中共陵水县委委员、中区区委书记。

一、抗粮斗争情况。陵水县的土地革命斗争是从抗粮斗争揭开序幕的。当时，全县稻田约五万多亩，地主占去多半。大部分农民成为“田仔”。他们除了缴交“押田金”和七、八成地租外，还要担负各种无偿劳役。一九二五年，陵水发生严重旱灾（史称乙丑饥荒），民不聊生，饿殍四野，大批奴仔象猪仔一样出卖，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地主奸商却收买贿赂贪官污吏，大发灾难之财。他们乘机垄断市场，大量囤积大米，提高米价，从中牟利。第二年秋收到冬收期间，地主奸商又勾结国民党县长邱海云，加重租税，并把大批粮食从新村港运往外地，昂价出售。他们这种不顾农民群众死活的行径，激起了陵水县人民的公愤，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到县国民党政府向邱海云告状请愿，要求减轻农民租税，禁止粮食外运。邱海云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抓走我提蒙乡农会领导人谢是位。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党组织和农会派我和副级长叶用祥带领农所学员，到盐灶、新村和各乡镇，揭露奸商、土豪囤积居奇、外运粮食的罪行，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千计的黎汉族农民，手持标枪、弓箭、大刀和长矛，以农所学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举着邱海云的漫画像，装扮成邱海云贪赃丑态，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邱海云！”“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严禁粮食外运！”等口号；同时，紧卡关口，封车封船，截回了大量外运粮食。农民运动的来势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邱海云被迫放出我农会领导人，并偕同反动民团头子曾三省等反动分子落荒而逃，退居北区贡举坡一带。这次抗粮斗争的胜利，初次显示了我党领导的陵水县农民革命力量的威力。海口“四·二一”反革命政变后，我们才被迫撤退到坡村（现在文罗公社新坡大队——县委书记黄振士同志的家乡一带），坚持武装斗争。那时，我们只有一百多人，几十支枪，力量还很薄弱。县委通过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群众，指出“耕者有其田”，废除苛捐杂税，带领群众减租退押，没收反动地主的官租分给贫苦农民，号召农民只有参加农会，才能翻身。群众发动起来了，并且争取了黎首王绍夷的武装，成立了陵水县农民自卫军。从此，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夺取县城以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农历）成立了琼崖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前后，我们的粮食、税收工作在县委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一直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创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

二、征粮工作情况。凡是官田、公田的官租，一律没收归公。陵水的官田、公田是比较多的，主要分布在军府、山牛六、龙塘、沟仔和艾指等地。军府的公田是书院田，丰年收七百多八百担租，歉年收六百多担；山牛六的也是书院田，丰年收三百五十担，歉年收三百担

左右；龙塘、沟仔、艾指的收一百多担；其余几十担的非常多。每到收获季节，我们派人下去，由他们报上，按数缴交。凡是地主奸商的租谷，按三分之一征收。如果有一百担租谷的，我们就收他三十三担。每一个地主的粮仓，我们都派监收员去检查监督，按时按数征收。如大地主张鸿犹的租谷有近千担，我们收他二百多三百担；元利、太和茂家都有千余担，各收他们三百多担；天德婆也有六、七百担，也收二百多担；一些百多担的如进本、琼元丰、琼昌盛、瑞金、徐则廷的都一样收他们三分之一。全年总共收有三千多到四千担谷。这些粮食，一部分用来支援群众，如生活困难的，被敌人火烧、抢劫的，我们视其实际情况补助他们，一部分用于我们的革命队伍，剩余的，按市价出卖，收入当作我们的经费。征粮工作除了派人下去外，我们还设立石丛、大艾肚、坡村、黎亭弓，高量五个据点，拦阻官租。租谷进不了城，地主恨得顿脚，反动派气得要命。一九二七年十月底，邱海云、曾三省和各区反动地主，以我没收官租为“罪名”，向国民党海南绥靖公署告状求援，请来二百救兵，伙同地主民团一千多人，向我根据地五个据点同时进犯，我农军坚守抵抗，敌人攻势凶猛，万丛、坡村、高量等四个据点先后失守，只有黎亭据点未打破。黎亭，地处要冲，横截陵河的上游和中游。我农军在黄家连、黄振士的指挥下，多次击退敌人的水陆进攻；打死打伤百余敌人，后来敌人调集四路兵力攻打，终因力量悬殊，弹药耗尽，鸡啼时突围撤走。敌人这次进犯，烧毁百多个村，所到之处，人民财产被抢劫一空，根据地人民损失惨重。县委及时把没收和征收的租谷分给受难的群众，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人民群众深受感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紧紧地连在一起，主动把自己的儿女送进革命队伍，农军迅速发展到二千八百多人。武器也增多了，有弹药枪、粉枪、荷兰枪、九节枪、长矛、阔口刀、单旋、澳门咀、单逼、十三响、毛音瑟码等。

三、捐献和税收工作情况。在尚未夺取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前，我们的经济收入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发动群众捐献。敌占区采取写信的方法，给一些深明大义的财主，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轻财重义，慷慨解囊，援助资金，支持革命。大部分的开明人士都肯解囊相助，但也有少数对抗的。他们公开把我们送去的书信撕掉，破坏捐献，对抗革命。在夺取政权后，我们枪决了两个极端反动的资本家，使捐献活动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是征收税款。陵河是从七弓流下来的，我们在合口那里设关卡，拦住水路收税。比如从保亭、七弓上游运下的木料，一支收五角钱税，藤一百斤收二元，沉香一斤收五角，益智一百斤收二元，鹿茸一副收四元，老鹿角一副收一元五角，鹿脚筋一副收二角，猕猴大的每只收二元，小的每只收一元至一元五角，猪仔大的（二三十斤）每只收二角，小的每只收一角。此外，还有商船从上游运下来的大批谷子，我们按大小箩计算。大箩（四斗，合一百市斤）收二角，小箩（二斗，合五十市斤）收一角。也收从县城到内地的货物税。如成衣成裤每套收一角五分，被面一条收八角，布匹每匹收一元至一元五角，棉纱一束收一角，红绒丝线等小杂货双方议价酌情收税。我们收税时发给税票，税票是由县政府印发的，有票头存根。当时的税收主要是以光洋和铜仙，一百个铜仙等一个光洋。三个铜钱等一个铜仙。

我任县财粮主任时，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各配一个征收员，都有票据发给他们，有条有据，账目分明。成立苏维埃政府后，经济工作由经济委员会统管，当时经委主任是符良清，委员是梁大强。

陈吉洲、陈家润整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

琼崖革命斗争初期的情况回忆（节录）

罗文淹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一）“五四”前后琼崖社会政治状况

琼崖有汉、苗、黎、俚等好几种民族，汉族人民占绝大多数，其余各族有几千至几万人不等，总共全岛人口约三百万。中农和贫农占大多数，华侨次之，富农地主再次之。人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一般是刻苦、耐劳、纯朴、顽强的。

“五四”前后（1911—1925年）的琼崖是在龙济光系军阀沈鸿英和陈炯明系军阀邓本殷更迭统治之下，他们除以一般的苛捐杂税剥削人民外，还特地开设烟（鸦片）、赌、花馆吮吸人民的膏血，毒害人民的体格和精神。

一般豪绅地主，主要以重租（季收谷物五成以上）和高利贷（年息一本一利，最重的叫“燕子钱”月息一本一利）剥削农民，有的竟勾结军阀政府，承包捐税，从中渔利。

这些军阀政府和豪绅地主把人民剥削得无法生活和生存，又把不满他们的人民当做“土匪”来剿、杀、奸淫、抢掠、烧，造成惨无天日的世界。尤其是邓本殷军阀，在他统治的年月里，几乎无日不“剿匪”，无日不杀人，有时一天枪毙三、四十人。

帝国主义者则不但在海口、府城开设领馆、商店、学校、医院、教堂，利用治外法权肆行侵略掠夺。就是各县、镇、农村，甚至苗、黎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他们的侵略足迹。尤其是法、日、英、美等国侵略者，他们借军阀政府为护符，勾结流氓恶棍、奸商、豪绅，到处活动，横行无忌。如海口日商“天寿堂”药房，“胜间田”商号，表面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是政治特务机关。一九三九年日寇占领琼崖时，就是“胜间田”做响导的。又如海口法国天主教堂、医院、学校，口头说是传教、医病、办教育，暗中是诱惑、杀害人民的。如一九一四年发生的海口法国“猪仔笼”案和一九五三年发现海口市法国天主堂医院杀害几十个婴儿取心肝五脏做药品运往法国案，就是事实证明。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则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豪绅地主互相勾结剥削压迫，使琼崖人民日益濒于破产，无以谋生。原来有些祖置的耕田，可以赖以生存的农民因承受过重的剥削负担，而年年被迫出卖，无业可就，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为了生活和生存，他们大批逃到南洋去做佃工，一部分则参加民军跟统治阶级作武装斗争。

（二）琼崖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反帝斗争：帝国主义对人民是无恶不作的，因此人民对帝国主义也就恨之入骨。

“民国”初期，海口法国领事馆包藏法商和一些中国奸商流氓恶棍，开设“猪仔笼”（一种暗中进行骗卖人口的商号），把城市乡村贫穷的人民骗到南洋去做苦工，当奴隶，给他们极少量（二、三十元）的安家费，说去了十年就可以回来，但这一去何时回来或永远不回来谁也不知道。这事搞得天怨人怒激起公愤。一九一四年二、三月间，海口市广大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捣毁“猪仔笼”商号（海口市得胜沙路），搜打开办“猪仔笼”的人，放出关在那里

等待着运往外洋的“猪仔”数十人。从此，法帝国主义者及其庇护下的奸商恶棍，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不敢再干“猪仔笼”的罪恶勾当了。这是琼崖人民反帝斗争胜利的第一声。

一九一五年，文昌县蛟塘市也发生农民怒打法天主教堂的斗争，原因是法天主教堂贿赂地方贪官污吏，强圈农民土地，扩建教堂，因而引起农民愤怒，不顾反动政府的干涉，把这家教堂捣毁了。

一九一六年，加积市美帝国主义教会、医院院长（美国人）因侮辱病人，也被群众殴打一顿，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叩头赔罪了事。群众说：美国鬼假老虎的面孔被揭破了，我们再也不怕他！

（2）反封建军阀，组织了“讨袁护国军”。护国军的总司令是陈侠农，后来是陈继虞。他们是接受孙中山领导的，他们的队伍有两三百人，士兵大多数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当时也叫做民军。

民军运动的另一个目标是跟当时文昌南部最强大，最横暴的豪族劣绅恶霸林肇周等做斗争。林肇周（满清秀才）等一向恃其有钱有势，横行乡里，欺凌弱小，鱼肉人民。一九一六年，他们勾结地方政府（县长胡喜）大买枪支扩充乡团，专跟民军为敌，不断地向四邻各乡村各族（姓）人民进攻，洗劫财物，杀人放火，奸淫妇女，野蛮残暴达到顶点。为了保护自己，民军结合地方群众于一九一七年秋围攻林肇周的大本营——贵德祠（文昌县白延市迈盈村）予以焚毁。但林肇周这个恶霸头子却逃脱了。这一斗争直到一九一七年中国政治局面改变以后才告一段落。

（三）大革命时期琼崖革命斗争情况

1、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加积农工职业学校。一九二四年，中共党员罗汉及王文明、扬善集联合地方进步人士王大鹏（当时作琼东县长，后来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当时一九二八年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任人民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在加积市北帝庙创办农工职业学校，一九二六年春改为仲恺农工学校，校长雷永铨（共产党员）担任，教学内容扩大，增设军事、政治学科，由陈秋甫、冯建农分别任政治主任和军事主任。

2、琼崖的收复。琼崖的收复是在广东省东江收复之后，陈炯明军阀余孽——邓本殷仍然割据琼崖，为非作恶，鱼肉人民，反对革命。为了肃清广东省内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根据地后方，实现北伐，在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一九二五年冬，国民革命军奉命发动南征，讨伐盘据在琼崖多年的邓本殷。邓逆本来号称有四万人，但在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的锐不可当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和十一师，在人民的支持帮助下，只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间，就把邓逆数万人全部消灭，迅速地收复了全琼崖。

琼崖收复后的行政工作是由国民党左派——革命派张难先负责。他一方面兼任琼崖最高的国民党组织——琼崖特约党部主任委员。他以琼崖行政专员和主任委员的职权，紧密和共产党合作，担负着领导、指挥全琼崖的国民党组织和行政任务。当时，他对于解除人民的痛苦，如取消苛捐杂税，取缔烟赌，惩办贪污和取缔反动活动等做了不少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取得琼崖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3、琼崖工农民众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琼崖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运动象春潮般迅速高涨，全琼性的和各县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各学校的和全琼的学生会都在一九二六年成立或恢复起来。他们除为自身利益提出要求外，还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要求民

主自由，要求民族解放，反对右派等口号，作为政治斗争的行动纲领。他们既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就开始发动斗争了。

4、苏区的财政经济。为了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当时党团政府、工农红军和民众组织的领导机构是非常精简的。各级领导同志多数都派到群众中去活动，留在领导机构内工作的常常不过两三人。党团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和普通工作人员，总共只有四五十人；红军则从指挥员至战斗员都是作战人员；合作社、械弹修造所、医院等则只有一两人负责、管理和保卫，余者都是生产、运送和医务人员。这些领导同志、红军战斗员、指挥员、生产和医务人员因为脱离了家庭生活，他们的生活（吃饭和胶鞋）由公家供给外，有家庭接济的同志，一般都不供给生活费用。由公家供给生活的规定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领导同志和一般同志之分。生活程度规定是很低的，相当于当地人民的一般生活，表示与群众同甘共苦，尤其重要的是节省财政的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

苏区的经济财政政策方针，就依据当时实际情况来规定，生产自由，支配自由，生活日用必需品公家也可以经营（合作社），但价格不能高于私营的同样商品，只能较低于私营商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甚至田亩正税都暂时停止不收——除土豪劣绅外。苏区的主要经济财政来源是没收反动派、土豪劣绅、奸商的财物，发动民众捐献和向殷富的人家商店募捐或借贷，公家（合作社）经营商品，这些财政收入的作法，在敌人未封锁苏区时是行得通的，敌人对苏区实行封锁后就不行了。因为这种作法是暂时的、不是正常的，不能完全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九二八年秋后，敌人的围攻天天的加紧，对苏区的封锁，越来越严密，公营（合作社）、私营的商品无法自由采购，而苏区又不能和平生产，自力更生。所以后来搞得米、油和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没有办法弄到手，弹药更无从接济，同志们坐视敌军的围困，吃野菜树叶充饥，病死饿死的人不少，形势日恶。根本的原因，除当时我们力量弱小、难以应付强大的敌人外，还由于我们的经济工作没有做长远之打算，因而失败了。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问题

苏区的土地革命工作一直没有作得好，可以说，甚至没有做。在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琼崖党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怎样去做土改，自己也没有做土改的经验，对土改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只有时提出谈谈吧了。当时一般领导同志对土地革命的了解，以为大概只没收极少数拥有土地极多的地主和一些反动官僚地主的土地及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对那些小地主和守法安分的中小地主，可能只没收他们土地的剩余部分，不是全部没收，财产也可能不动，斗争更不须有了。换一句话说：土地革命是政府的事，由政府下令去做就成了。因此，大家都这样认识：这事等到将来革命政权普遍成立和巩固后才着手去做，现在就开始去做是靠不住的，而且使人心惶惑，对革命进行是大大不利的。所以，当时琼崖党并不真正把土地革命提到革命斗争的日程上来，看做当前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有的苏区有些反动地主是跑到城市上去了，他的田地分给农民，农民也不愿意去耕，思想上总觉得是人家的东西，怕人报复，即使人家不报复，也觉得拿人家的东西名义上也不大好听。所以土地革命工作在琼崖当时来说只是口头上讲讲，始终没有踏踏实实付诸实行。就是在琼崖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不过是原则上的通过决议，并没有制定实行的详细计划和条文，土地革命没有普遍的实行，农民斗争没有普遍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在农村的根基没有铲除。那末形势一变，农民群众就由害怕而动摇、消极，而后站开了。

琼崖的“小莫斯科”

——土地革命时期活跃的乐四区后勤工作回忆①

王先明、王兆文、王时香、蔡亲民口述②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然而，在土地革命时期，乐会县的第四区，也被人们称为“小莫斯科”。

没有哪个伟人来命名，而是因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初，琼崖特委、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乐四区苏维埃政府、乡农会都驻在乐四区的上科乡一带，这里山青水秀，森林茂密，党以这块红色区域为核心，领导穷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青年们纷纷投奔这里当红军，爱国华侨也慕名归向这里参加革命。加上上科乡有个“科”字，人们引伸思义，所以就叫“小莫斯科”

开创“小莫斯科”的领导人，有杨善集、王文明、许侠夫、王文儒、冯平、周逸、黄昌炜、陈垂斌、符传范、符节、陈永权、陈秋甫、严凤仪、徐成章；还有张良栋、王卓如、王仲芳、符赤民、陈振亚、黎育才、陈赞余、符良清、王守汉、庞世泽、谢文川、王炳南、梁春、许上为、王业岗等。

一九二八年夏，在“小莫斯科”的阳江墟高岷村，琼崖特委召开全琼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王文明。同年六月，乐会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黎育才。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

为了宣传马列主义，组织穷苦大众起来革命闹翻身求解放，在“小莫斯科”办起了列宁学校，军政学校，印字局、医院、消费合作社、军械局、缝衣局、还修公园、建琼剧团（一个叫“世京团”，另一个叫“永鸾团”），全乐四区有上科、乐新、大同、造文关、南勋、大南、君仲、大新、山尧、赤赤等十个乡，乡乡搭戏台。当年的“小莫斯科”，军政训练，文化生活，支援前线，如火如荼，实在活跃。

在“小莫斯科”上空，镰斧红旗迎风飘扬。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旧礼教！”“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严禁赌博，严禁鸦片！”“废除娼妓，提倡妇女剪短发、解除缚足，实行男女平等！”的标话，到处张贴，口号声响彻云霄。

“谁是工农兵，我是工农兵！自由被剥夺，受苦受难受压迫……，拿起刀枪去战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向前进，向前进”的《工农兵进行曲》震荡人心。

“小莫斯科”的列宁学校，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办。开设二门课程：军事、政治，专门培训军事指挥员和政府的领导干部。校长王志超，教员有七个，校址在土地岭。

①访问王先明、王兆文和娘子军老战士王时香、蔡亲民记录

②王先明、王兆文是当年赤卫队员，王时香是娘子军连指导员、蔡亲民是娘子军战士

学生由各县、区、县选送。毕业后，学军事的当排长以上干部，学政治的当区长以上干部，原打算办多期，一年办一期，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仅办一期，培训了一百二十名学生就停办了。县、区也相应开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琼崖特委还专门开设了一所军政学校，除了专门训练军事指挥员，还训练赤卫队员，县和区都成立赤卫队，操场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在内园。

“小莫斯科”还办印字局，局址在土地岭，主任叫何汉民，他能写一手好字，能做精工的木刻。有油印，也有木刻、石印。设备虽简陋，但当时可说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列宁学校的课本，军政学校的学习资料，党政领导机关的通令、小报、传单，由印字局出版、印刷。参加印字的人数，任务繁重紧张时达二、三十人。

“小莫斯科”还办有军械局，军械局先设在内园，一九二八年底，革命低潮时搬入排水庄，那里山深林密，红军、赤卫队的刀枪坏了，就送到军械局修理；子弹、地雷缺了，就来军械局运去。龙山村的符世钦、符良清会修枪、造子弹、地雷，他俩当军械局的负责人。造军械不但要保密，还会伤害生命。有一个叫殿英的人，他的儿子造地雷时不慎炸死了。为了支援前线，我们大家不怕死，革命哪有不牺牲的呢？造子弹、造地雷的药，有炸药也有炮竹药，用牛奶罐制。军械局还造过一门“荔枝炮”，用结格的荔枝木造。首次攻打中原，大部分军火是军械局制造的。

军民要买牙膏、牙刷、面巾、烟丝、油盐，在“小莫斯科”的销费合作社有供应，社址在上科村。销费合作社还销售布匹、纸张，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的商人，从万泉、加积、乐会等地贩货运进山来，转卖给销费合作社。军、政人员吃肉、菜可到“销卖场”去买。群众经常挑椰子、蔬菜、农村产品在山寮、玉石坡这二块地方交易，“小莫斯科”的军民管叫这二块地方为“销卖场”。

土地革命时期，虽然缺医少药，但是在“小莫斯科”医院，中、西、草医药俱全。医院设在岭脚，主任是王绍泮，庶务长叫周树瑞。中医师有陈祥光、陈宪龙、冯玉甫、西医师叫周良勋。草药从山里采集，中、西药来源较难，但革命群众、爱国华侨心向“小莫斯科”，总是千方百计支援。记得乐会县有一个叫欧明新的，在我们政府内干事，党派他去南洋募捐，侨胞们知道他是从乐四区来的，个个都慷慨解囊捐献。可见“小莫斯科”誉传海内外。

军、政人员穿的衣服，全靠“小莫斯科”的缝衣局缝制供给。连买带借共有七、八部缝纫机，缝衣补裤，每人每年分配二套衣服。

每月，世京剧团，永鸾琼剧团还演出三、五场琼剧，在“小莫斯科”演，也到毗邻县去演。

办学校、销费合作社、军械局、印字局、又办医院、缝衣局、剧团、钱财哪里来？一靠群众募捐，群众有钱捐钱，有粮捐粮，有物捐物，也发动海外华侨募捐；二靠打没反动奸商财物。

县苏政府成立经委管理，一名财委专门理帐，收入、支出每日登记，月终造报表送县苏审核。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小莫斯科”传播，革命的烈火从“小莫斯科”燎原，千万劳苦大众的心亮了，于是，就形成了一支不可挡的革命洪流，犹如汹涌澎湃的万泉河，激流勇进。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农历八、九月间，举行了威震敌胆的秋收暴动，县委书记王卓如当指挥，陈振亚当付总指挥，红军三十多人，乐会县男女老幼好几千个，组成了破坏队，救护队，没收队，浩浩荡荡，打响了围攻中原的战斗。

那次攻打中原，琼苏政府，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事先交代要记住铺号门牌，哪间该打没

（反动奸商），哪间不该打没。

战斗结束，没收了反动奸商大批杂货、布匹、现金（光洋、纸币）、药材、铁器等。这些物资由没收队送往“小莫斯科”去。

“小莫斯科”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曾断言：一定要在琼岛地图上把它拔掉。一九二八年八、九月，蔡廷锴十九路军压琼，“小莫斯科”上空一时乌云密布，但革命火种不能扑灭。一九三二年，国民党陈汉光部妄图荡平“小莫斯科”，然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更加众志成城，“小莫斯科”没有被荡平，倒是陈汉光部损兵折将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小莫斯科”的党、政、军和革命群众，用血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琼崖的“小莫斯科”，让这革命的名字一代传一代。

琼海县财税史领导小组整理
海南财税史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元月三十一日

我在万泉河上收木筏税的回忆

王植三

回忆这段历史，时隔五十年了。海南岛二十三年革命红旗不倒，真是来之不易。

国共合作时期，我们革命先辈趁合作时机，以国民党左派面孔潜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一切生活费用依靠国民党，大部分有文化知识的共产党员，靠教书或搞其他科学技术性工作度活，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所得的工薪，除个人吃饭和一些生活用品外，其余全部缴纳党费。

一九二七年，蒋帮大搞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那时，我们党的组织不得不搬到农村去。党中央指示，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对吃饭、穿衣问题，主要是靠人民群众献捐来解决，没有什么财经机构。后来，革命先辈徐成章、杨善集、王文明等同志，开始重视财经税收工作。

一九二八年，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设立经济委员会，王大鹏同志当主任，掌管财经税收工作。

从五指山发源的万泉河，位于琼崖东路，弯弯曲曲的流水，滚滚而下，奔向琼东、乐会县境内流入南海。商人经常从五指山区采集山货、木材、放竹筏由万泉河运到加积镇出售，是琼崖东路富庶之地，商贾贸易活跃之所，也是我们财政收入的源泉。当时曾收木筏税，每束五角钱，是清党前的特定税收。

一九二八年，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主席王文明同志决定继续征收万泉河的木筏税，同时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每年，木筏税收入达数千元光洋，对供给琼崖党政、军必需的开支，起着很大作用。

可是国民党和加积镇商团团长何清雅，绰号“大炮四”，曾多次出兵袭击我税收人员。但我们几个人一听到情报，立即疏散深山密林回到群众之中去了。他们摸不到我们的踪影，枉费了心机。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蔡廷锴、张世德带一个师兵力，压在琼崖东路的乐会、万宁等县，采取封锁、围剿、移民迫降手段，捕杀共产党人，杨言六个月消灭琼崖共产党。琼崖东路革命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坚壁清野”斗争。这时万泉河木筏税锐减。为了增加收入乐会县委又派我加强这项税收工作。当时我从红军分配到乐会县苏区工作。我刚到双夏岭（龙江、文曲之间）一个月左右，就收光洋三百余元，及时上交，支持我党政军费用开支。不久，因革命斗争需要，我被分配到乐会县三区工作，以后这段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

回忆母瑞山根据地艰苦 斗争生活和琼苏经委工作的情况

李 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了革命，破坏国共合作，投靠帝国主义，在上海开始实行“清查”运动，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接着，四月十五日，在广州也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四月二十一日也在海南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分子的屠杀，幸好琼崖党组织在四月二十日晚接到了广东省委的指示，迅速地将革命力量撤到农村去。我们的党员、干部退到农村后，反革命的武装也就追到农村，对革命村庄进行了残暴的抢掠和肆意的烧杀。在这种情况下，琼崖党组织不得不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拿起武器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自从“四·二一”政变以后，琼山、琼东、文昌、定安、乐会、万宁等县都很快地建立无数的小型武装组织，并向反革命展开了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六月，广东省委派杨善集同志返琼崖，传达省委关于坚持琼崖斗争的全面指示，从此，全琼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扩展了武装队伍，党的组织也扩大了。从一九二七年五、六月至十一月间，琼崖革命在不断发展，工农革命军迅速发展在一千多人。

一九二七年，琼崖党领导秋收暴动，这是琼崖革命力量的大检阅。讨逆军和农民紧密配合一起，组织起来向反革命大规模的进攻，那时和我们打得比较厉害的是国民党叶肇部队，由于我们还没有学会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因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开始，我